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二十五军卷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二十五军卷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七至第八部分文章 60 篇

七、回忆长征人物

杰出的红军将领吴焕先

程子华

焕先同志英勇牺牲已经50周年了。今天，我能够来到烈士的故乡，参加纪念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杰出的领导者吴焕先同志，真是感慨万千。我作为焕先同志的战友，和与会同志一样，对他充满无限怀念，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此，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委托我代表军委对焕先同志表示深切怀念，并向焕先家属表示慰问。韩先楚、刘震同志因病、刘华清同志因出国访问不能前来，我代表他们向焕先同志表示深切哀悼。我还代表红二十五军尚健在的老同志讲几句话，寄托我们的深切怀念之情。

焕先同志，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早在1926年，他就从事农民运动，参加领导著名的黄麻起义。1931年以后，他历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时，焕先同志留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他根据鄂豫皖省委决定，主持重建红二十五军，并先后担任军长、政治委员。

焕先同志领导重建的红二十五军，两年间经历了四次、五次反“围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胜不骄，败不馁，表

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坚定信念、革命气质和斗争精神。焕先同志在领导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我与焕先同志相识于1934年11月间。那时，我受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委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有幸和焕先同志一起并肩战斗。我们共同率领红二十五军进行长征。在此期间，我与焕先同志朝夕相处，休戚与共，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极其光辉的战斗历程。焕先同志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伟大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渝；他胸怀全局，无私无畏，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胆略和领导才能；以身作则，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临危不惧，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勇于献身的战斗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记忆犹新。

长征入陕后，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身患重病，我和徐海东同志又负了重伤。在此严重时刻，焕先同志勇挑革命重担，主持全面工作。他一面率领部队行军作战，一面领导开辟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他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两次反“围剿”斗争中，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显示出他的卓越智慧和领导才干。徐宝珊同志病逝后，焕先同志代理了鄂豫陕省委书记，肩负的责任更为繁重。

1935年7月，我们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之时，获知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焕先同志在长安县沔峪口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作出率红二十五军西出甘肃，直逼敌军后方，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①。在远离中央领导，又与兄弟红军隔绝的情况下，省委能够独立自主地作出这一战略决策，是与焕先同志通观全局的战略远见，坚决果断的革命胆略分不开的。历史证明，这一重大的战略行动，完全符合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符合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领主力红军抗日北上的战略意图。

^① 原文引自鄂豫陕省委1935年7月30日写给郑位三等同志的指示信。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正确路线的确定，首先应当归功于焕先同志。

焕先同志的党性观念很强，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十分信赖和崇敬。长征到达陕南时，焕先同志曾多次说过，消灭敌人一个团，都不如缴获一部电台，有了电台就可以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为了向中央报告情况，我们从泮峪口出发的第二天，他连夜写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书面报告，就红二十五军的作战行动，有关斗争策略和省委工作中的进步和缺点，如实向中央作了反映。西征北上途中，焕先同志常派手枪团搜集各种报纸，借以了解主力红军的行动消息和川、陕、甘边的战事动向。记得打下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后，就是从截俘敌少将参议的口供和几张《大公报》上，进一步获悉主力红军正在北上的确切消息。焕先同志及时向部队提出“迎接党中央”和“迎接主力红军”的战斗口号，鼓励全体指战员奋勇向前，积极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焕先同志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政治家的远见，是全军公认的领导核心、卓越的决策人，深为指战员爱戴和崇敬。长征途中，部队每路过一地，焕先同志都不顾个人劳累，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状况和民情风俗，及时地制定出新的政策、策略。我军从泌阳以东地区路过时，沿途地主武装盘踞的围寨很多，为争取时间急速北上，焕先同志曾提出不进围寨，不打土豪，部队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并指示给寨主头目写信，散发“北上抗日出发宣言”，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使其晓以民族大义，沿途勿加阻拦。这些政策措施，都收到良好的效果，保证部队顺利穿过豫西平原。在进入回民聚居的兴隆镇时，焕先同志根据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并亲自拜访清真寺，赠送匾额和礼品，赢得宗教人士和回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后来，毛泽东同志曾赞扬过红二十五军路过陇东回民地区时留下的良好影响，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焕先同志在红军中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

育，但他能够在革命战争中学习战争，长期的战争实践造就了他的军事才能，提高了他的作战指挥艺术，成为一名英勇善战的军事家。在多次极为险恶的战斗中，焕先同志都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使部队一次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长征入陕途中的独树镇战斗，焕先同志手执大刀奋勇当先、坚决果断指挥部队与敌英勇冲杀的激烈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到达陕南以后，令人难忘的庾家河战斗，也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激烈恶战。当时，我和徐海东同志都身负重伤，情势十分严重。焕先同志亲临前线，继续指挥部队作战，与敌反复冲杀20余次，终将敌人击退，使红二十五军得以在商洛山中站稳脚跟，开创了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8月21日，我军抵达甘肃省泾川县境，焕先同志正在指挥部队南渡汭河，敌三十五师二〇八团1000余人，突然从泾川县城奔袭而来，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在四坡村与敌展开激战。时值大雨倾盆，河水猛涨，我先头部队过河后，难以回援，后卫部队处于背水作战。焕先同志见情势危急，亲自带领100余人攀登陡崖，直插入敌人侧后，勇猛反击敌人。敌二〇八团千余人全部被歼。战斗中，焕先同志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8岁。全军指战员无不悲痛落泪。

同志们，焕先同志离开我们整整50年了。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的戎马倥偬的光辉一生，早已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为之英勇奋斗的未竟事业，将在党的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指引下逐步实现。焕先同志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勇往直前，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1985年10月27日

选自芦振国、姜为民编：《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19—223页。

寄语商山忆英烈

——缅怀吴焕先同志

郭述申

在迎接红军长征50周年的时候，回顾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经过，尤其是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的壮烈牺牲，更使人思绪联翩，感慨万千！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于1932年冬重新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吴焕先同志当时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留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他根据鄂豫皖省委决定，亲自主持组建红二十五军，先后担任军长、军政治委员。两年间，在数十万敌军四次又五次“围剿”中，他领导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4年冬，红二十五军奉命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初期，省委书记徐宝珊身患疾病，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当时由焕先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他独挑革命重担，既抓部队工作、指挥作战，又抓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武装和基层政权，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创建，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之时，焕先同志以其远见卓识、胸怀全局的革命胆略，为配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坚决果断、及时正确地作出西征北上的战略决策。他具有高尚的革

命品质、坚强的斗争决心、卓越的战略远见和领导才能，是全军指战员公认的杰出领导者。他的壮烈牺牲，全军上下无不悲痛万分，热泪盈眶……

焕先同志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陇东高原，距今已整整半个世纪。历史岁月洗汰了记忆中的许多往事，但他那么一副令人难以忘怀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西征北上途中，我们曾在甘肃两当县城拍过一张合影照片，我将它一直带到陕北。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时，这张照片由杨尚昆同志转到斯诺手里，现仍见之于《斯诺眼中的中国》画册。瞧他那么一副雄姿英挺的神态：一身灰布军装，一顶深灰色的八角帽，挎着一支手枪，胸前的第三颗纽扣上，挽着一条怀表链……多么熟悉而又难忘的形象啊！长征途中，难道就留下这一幅珍贵的合影留念么？时隔50年之后，该从何时何地寻觅他所留下的战斗足迹！我情不自禁地沉入在历史的烽火硝烟之中……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从1934年11月16日到1935年9月15日，为时整十个月。其间，以七个多月转战于商洛山中，创建了新的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使自己得以立足和休养生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几进几出的商洛山中，既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的落脚点，又是继续西征北上的出发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也曾留下光辉的一页。好在近几年我曾两次重返商洛地区，只有趁这两次难得的旧地重游，就我的一些所见所闻以及对历史的回忆，选上几页片断加以叙述，借以告慰我最崇敬的革命英烈——吴焕先同志！

一、庾家河水起洪波

庾家河的流水，翻滚着银白色的浪花，哗哗东流而去……

这个深山峡谷中的乡镇，一条拐弯小街，也不过30几户人家，开有几所杂货店铺。据说，这地方是个南北通商的必经之地，南通商县之龙驹寨

(今为丹凤县),以至湖北境内;北可抵达西安、华县、池关等地。许多南来北往的商客,也多在此歇脚住宿。每到一、四、七逢集之日,周围几十里以内的山民都在此赶集,别有一番山乡风情。

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经由箭杆岭进入陕南境内,歼灭三要司守敌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一个营。第二天,即翻越蟒岭,到达山中小镇庾家河。省委和红军的几位领导同志,就住在小镇拐弯处的一家中药铺子,店名“春永茂”。当天,就曾发生一桩饶有情趣的事:

“春永茂”药铺掌柜杨春荣,在红军进入小镇之前,听信了一些谣言,以为红军都是些“血脸红头发的怪物”,就躲到附近山林里去了,压根就没敢露面。当晚,偏又被红军抓住。此人三十五六岁,头戴一顶皮帽,身着棉袍,战士们都认定是个“大土豪”,马上就扣押起来。过后经过一番了解,街民们都说:“药铺的杨掌柜,是个大善人,好得很!”这才弄清此人自小在药店当过学徒,懂得一点医道,因为生活所迫,曾挑着一根扁担到潼关等地跑过几年山货买卖,随后在此地开了个中药小铺,为人老实厚道,也没啥政治嫌疑。军政委吴焕先听说这事以后,忍不住呵呵笑道:“开上个中药铺子,也是救死扶伤的慈善事业。我们就住在人家铺子,还把掌柜的扣留起来,实在不够意思啰。赶快放了,放了,莫把个‘善人’当成大土豪!”马上就叫人为之松绑,并向其作了一番解释,表示歉意。杨春荣对红军有了认识,又出于对红军的感激之情,当时还从家里拿出好几斗包谷,资助远道而来的红军。听说杨春荣随后还掩护红军伤员,配制了专治红伤的药物,为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放了一个“杨善人”,在小镇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都说红军的好话,能把好坏分清,没有冤枉“杨掌柜”!可是,吴焕先心里却感到是个事儿,当晚就跟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进行商量,决定由郑位三起草一份张贴传单,借以安定民心,使群众真正了解红军队伍。第二天,《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就在街头上张贴出来。几百字的一页传单,把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都写得一目了然。记得末尾还有两

句十分自豪的话：“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好几十万，……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

12月10日这天，鄂豫皖省委就在“春永茂”药铺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及时作出《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区的选择和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决议中写着：“鄂豫陕边区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的条件上，在同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配合上，在地势的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同时还提出：摆在党的面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工作，要求“每个党、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解除民团武装，消灭境内的国民党匪军，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政策方面，提出要“与没收富农、资本家的过早办法作无情的斗争”。决议草案特别强调在重大的战略转变面前，必须“向全党同志深切指出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坚定每个党员的意志和信心，……为着当前的光荣事业和任务而斗争”，并提出“立即创建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省委庾家河会议，对鄂豫陕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而，就在这一天，原来驻守在朱阳关堵击红二十五军入陕的敌六十师陈沛部，突然从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敌我双方就在庾家河的东山坳口，展开一场激战。我全体指战员顽强抵抗，英勇奋战，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搏，反复冲杀20余次，其紧张激烈之情景，实属少见。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最后，终于在吴焕先政委指挥下，将敌人彻底打垮，毙伤敌800余名，我亦伤亡200余人。至此，我军终于在陕南站住脚跟，并赢得了开辟新区的时机和条件。

战后，焕先同志肩上的担子更加繁重。省委书记和军长、副军长，都躺在了担架上，每天都得由部队抬着，随军行动转战。这一时期，焕先同志按照省委作出的创建新区的方针任务，采取了大回旋的军事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出卢氏，西转蓝田，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消灭了许

多民团，打击了地方的反动势力，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部队所到之处，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镇压土豪恶霸，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配给贫苦百姓。一些“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了粮食，解决了饥寒；许多衣不遮体、“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人家，也分得了衣物；商县孙家山有个名叫狗娃子的农民，经过红军救济之后，全家才穿上了裤子，群众反映说：“红军来了，狗娃子一家能出门见人了！”少数群众心有疑虑，不敢公开接受斗争果实，指战员就在夜里将衣物粮食送上门去。因此，到处传说红军是“活神兵”！

商洛山区的贫苦群众，从水深火热之中逐渐觉醒起来，看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打天下的，都打心眼里高兴！

二、鄂陕边界播火种

是年12月下旬，部队进入鄂陕边界一带活动。经过一段实际调查，省委依据当地群众反抗苛捐杂税的迫切要求，及时提出“五抗”（抗捐、抗债、抗粮、抗伕、抗丁）的斗争口号，决定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在鄂陕边界创造革命根据地。吴焕先根据这个决定，马上就作了新的部署和安排，领导部队投入开辟新区的斗争。

在镇安县的九甲湾，军政委吴焕先决定派陈先瑞同志带领一个连队，就近在镇安、山阳、郧西等地，开辟新区工作。陈先瑞当时只有20岁，是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长征入陕经过卢氏县城时，脚上负了枪伤，还没有痊愈，走路一颠一跛的很不得劲。因为部队初到陕南，人生地不熟的，怕担负不起这个重任。吴焕先对他讲道：“其实，也没啥了不起的！给你派上一个战斗连队，再配上个大个头警卫员跟着，甩开膀子干上一场！就是受点损失，也不要泄气，还可以重整旗鼓，再干就是……”吴焕先随后又讲了讲省委的行动意图，说派到地方工作的每个指战员，都是一颗革

命的火种，将很快燃起一团团斗争的烈火，照亮一块块新的天地。几句话讲得陈先瑞心里热呼呼的，他想到军政委的信任，革命斗争的需要，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所带领的二二三团七连。当时改称为“鄂陕游击师”，由他担任师长。吴焕先还向他交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了解边界地区的地形和社会民情，尽快熟悉和掌握地方情况；二是以“五抗”斗争口号广泛发动群众，消灭地方反动势力，建立群众武装，成立苏维埃乡村政权；三是与军部保持联系，将活动情况和敌情动向及时向领导报告。第一批革命的“火种”，就这样不失时机地撒播开来。

不久，吴焕先带领主力部队一举攻克镇安县城，于当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捉拿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生产兴业，造成工农群众自己的镇安县。这时，吴焕先很快将主力部队遍及于镇安、旬阳、郧西、山阳等县边区，乘胜横扫地方民团，广泛宣传“五抗”，发动群众镇压土豪恶霸，摧毁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在镇安县的白塔、茅坪、大小米粮川，郧西县的一、二、三天门和丁家坪等地，建立了第一批区、乡、村苏维埃基层政权。部队也扩充了400多名战士。等到敌人发动第一次“围剿”时，已在鄂陕边界开创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为反“围剿”斗争和继续创建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之后，经过蔡玉窑、葛牌镇两次战斗，歼敌一二六旅三个多营，乘胜在兰田、商县、柞水、镇安、山阳等五县边区，很快又开创了第二块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中旬，省委在郧西县二天门召开常委会议，总结了入陕两个月的斗争情况，并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单独创建根据地”问题，进行过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因在庾家河战斗后，省委有少数同志认为领导干部伤亡较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单独创建新苏区似有困难，曾提出过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意见；随着敌人围攻的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更加助长了这种思想。为了统一思想行动，坚定反“围剿”

斗争和创建新区的决心，郧西会议批评了这种思想情绪，提出要“克服自己怕苦畏难的落后情绪，看清必然胜利的前途”。在这次会议上，吴焕先同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反对入川的错误主张。他认为在鄂豫陕边创造新的根据地，“对配合川陕和陕北两个苏区与红军行动，仍是能够实现的，是有意义的，在发展前途上可以打通两个苏区，与联系两地红军。特别是在现时敌人集中力量进攻川陕苏区，我们对敌人的牵制，对红军的配合，更为重要迫切”^①。他认为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曾打过一个生动而又形象的比喻，把商洛山比做一个“香炉脚”，完全可以与川陕和陕北两个苏区互为犄角，撑起一座革命的“香炉”。因此，他主张按照“省委庾家河之决定不变”^②！

会后，省委决定建立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派我下去担任特委书记，陈先瑞同志为游击司令，统一领导鄂陕边区的工作。与此同时，在焕先同志的具体关照下，我们分别将镇安县店垭子、郧西县一、二、三天门、山阳县唐家河等地的抗捐军和游击队，改编为五、六、七、九路游击师，将陈先瑞所带领的七连扩编为战斗营，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坚持对敌斗争，以巩固和发展已经建成的南北两块革命根据地。

三、袁家沟口举战旗

这是1935年春节期间的事。当时，我在军政治部担任副主任，跟随军部一起行动。记得葛牌镇战斗以后，打退了敌一二六旅两个团的进攻，部队进驻到山阳县的袁家沟口。当地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就在这时举起了革命的战旗！

袁家沟口这个山大沟深的乡镇，交通比较闭塞，虽说开有几十户店

① 引自吴焕先1935年7月17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

② 引自吴焕先1935年7月17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

铺，街市也不那么景气。30年代初期，据说这里就兴起过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以锄头棍棒为武器，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号称“万户蜂”！县府衙门胆敢来此地催粮、逼捐、收税，就要当心这万户之众的愤怒的蜂，蜇他个鼻青眼肿，这个“马蜂窝”是捅不得的！1933年，山阳县民团头子唐靖，曾带队包抄过“万户蜂”，结果被农民群众打了个埋伏，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慌忙退回县城。这一仗，听说还缴了几条长枪。当地老百姓都拍手称快：“唐靖犯了地名了，糖（唐）叫蜂给吃了！”

“万户蜂”是以庙沟村的阮英臣等人，领头聚众起事。他们随后又以“抗粮抗款”为宗旨，组成一支“大刀会”，推举阮英臣为其首领。红二十五军到了袁家沟口以后，当即跟这个“大刀会”接头联系，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军政委吴焕先亲自跟阮英臣等人作过交谈，向他们讲明红军的革命宗旨和任务，动员他们以“五抗”为斗争口号，发动当地的农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阮英臣等人深受感动，决心在红军的帮助和支持下，把“大刀会”重整起来。第三天，阮英臣就领着一支成百人的农民队伍，来到了袁家沟口，接受红军的委任和领导。

这天，吴焕先政委亲临现场，热烈庆贺这支地方武装的成立。吴焕先对他们讲了一番表示支持的话，他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官府衙门的苛捐杂税太重，多如牛毛，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儿，直不起腰来，就得组织起来造反！要反，就反它个底朝天，建立劳苦大众的革命政权！当时，就命名这支队伍为陕南第四路游击师战斗营，授予一面鲜红的战旗！并委任阮英臣为四路游击师师长兼战斗营营长，委派红军指导员夏云亭同志为战斗营政委。与此同时，还把红军作战中缴获的三挺轻机枪、80多支步枪、近千发子弹和成百颗手榴弹，配发给这支新成立的地方部队。陕南第四路游击师战斗营，就这样威风凛凛地武装了起来。

不久，袁家沟口也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地址就在“丰源”商号里面。门前贴着这样一副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附近山村的老百姓，还特意送来一块油漆匾额，刻着“工农当权”四个大

字，高高悬挂在屋内。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是“万户蜂”发起人之一程家盛。

从此以后，这支地方部队就以袁家沟口为中心区域，活动于山阳、镇安、柞水、兰田、商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坚持对敌斗争。他们先后歼灭二道沟税警队和牛耳川、色河铺、金井河等地民团，摧毁了几处伪乡政权，声势越来越大。队伍很快发展到300多人，全营编为四个连队，连排干部大都是红军中伤愈归队的战斗骨干。听说其中有好几个排长，还是红四方面军当年过境时留下的伤病员，这时都自动归入地方部队。

7月初，红二十五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过程中，将陕军警一旅唐嗣桐部诱入袁家沟口，打了一次伏击战。当时，第四路游击师也参加了战斗，配置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堵截沟口，并担任战场警戒任务。这一仗打得相当出色，我军一举歼灭陕军警备第一旅，毙伤敌人300余名，俘敌140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1000余支。敌军旅长唐嗣桐，也被红军活捉。以“万户蜂”起事的袁家沟口，老百姓更是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唐嗣桐也犯了地名啦！一个旅的糖（唐）块，全都叫蜂吃光了！”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而富有情趣。

第四路游击师这支在战斗中诞生和成长的地方武装，在袁家沟口大捷之后，便跟随红二十五军一起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西征北上的途中，正式编入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同志当时还作了讲话动员，夸奖过来历不凡的“万户蜂”的子弟兵。280多名“万户蜂”的子弟，都在红二十五军这支英雄的部队中英勇战斗，纵横驰骋……

四、洛南县城传佳话

1935年4月18日，红二十五军攻克了洛南县城。这是继镇安、柞水、宁